

中國農村題材小說中的土地集體化 (1949-1966)：以政治經濟與空間為考察視角*

宋尚詩**

摘要

土地制度變革（私有→集體化）或是1949-1966年間最重要的空間實踐，這反映在當時農村題材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土地集體化，合作社之優越性端賴「增產」來保證，與單幹戶的「勞動競賽」情節應運而生。通過新工具、新良種、新的種植方法來提高單位畝產量，以及挖渠引河等水利工程來拓展空間是小說的典型情節——這暴露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內在結構性問題，其優越性體現在開荒、開渠、興修水利等宏大空間工程上；處理小單位的「精耕細作」時，會顯得捉襟見肘——小說情節矛盾也多在這一空間內展開。

然而，「增產」話語的複雜性在於它既有可能來源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也有可能來自於社會主義。本文分析它們二者如何糾纏在文學文本中，它們在文本中的對峙也是文本外更廣闊的意識形態戰場上的對峙之鏡像。

本文對此深入辨析，以政治—經濟與空間理論的角度觀照這一時期的小說。如果說土改小說所關切的，本質上是空間私有權的佔有與分配；那麼，農業集體化題材所關切的是空間中生產關係的根本改變。

* 本文為揚州市「綠揚金鳳」優秀博士計畫項目（項目編號：137012352）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受益良多，特此致謝。

** 揚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本文釐清其間盤根錯節的互文性線索，並將其放置到更廣闊的「社會文本」中去發掘其豐富性。

關鍵詞：農村題材、集體化、農業合作社、土改、空間理論

一、前言

1949 年後，土地制度變革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空間實踐，因為它聯結著波譎雲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暴露其中的一切矛盾。「約有三萬萬以上的無地少地農民分得了約七萬萬畝土地，此外還獲得了大批耕畜、農具、糧食、房屋及其他生產資料……被封建主義統治了三千年的中國農村從此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¹ 土地所有權關係的流轉及其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問題，昭示了從土改到土地集體化、農業合作化中的種種複雜性。

這泥沙俱下的過程也反映在 1949-1966 年間的農村題材小說。一個重要表現是，「土地／空間」正在被「重新表述」。要在這個基礎上來看待「農村題材」中土地的分割、合併、形成與重塑，空間與其中的人們都在面臨改造。

秦兆陽（1916-1994）反映合作化的短篇小說〈劉老濟〉（1953）中有如下一段話：

你看眼前這一片地，多寬闊！多平坦！真是沒邊沒際哩！界線？哪裡是個界線？你看得見界線嗎？你分得出哪塊地是誰家的嗎？……哪裏是地界？地界都裝在人們腦子裏的，是人把它分出來的。往後，集體了，地界就不分了，那可就痛快了，也分不清你的我的了——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那可省多少心啦！²

這段話憑著土地邊界的消泯具象地演繹了集體化的「落地」過程：土

¹ 鄧子恢，〈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和方針政策——一九五三年七月二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日報》第 1 版，1953 年 7 月 22 日。

² 〈農村散記〉是由數個短篇組成，〈劉老濟〉是其中之一。參見秦兆陽，〈農村散記〉，《人民文學》1953 年第 5 期（1953 年 5 月），頁 20。

地的邊界在消泯，意味著農民的私有意識也在逐漸消泯：「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當然，這是小說家在文本中的希冀，歷史的進路不會如此順遂。現實中「集體化」所席捲的土地制度變革終止的是鄉村悠久的個體勞動形式，包括附之於上的政治、經濟、道德等社會文化結構，因此，新的空間政治攪動的是整個鄉村生活秩序和其間的心靈：農業集體化也在構建心靈的集體化。它引起的各種震顫，要遠遠超過小說的呈現限度。而探討文本內外這一限度的臨界點，正是我們接下來的任務。

本文的論述採用環環相扣的方式，即從一個小切口切入，一節的末尾提供了下一節討論的契機，總體呈遞進的態勢。概括說來，本文的邏輯理路如下。

在 1949-1966 期間的農村題材中，「增產」是顯要主題，它成為本文的切入口。建國後，增產攸關政權命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土地集體化，那麼合作社之優越性端賴「增收」來保證，與單幹戶的「勞動競賽」情節應運而生。通過新工具、新良種、新的種植方法來提高糧食的單位畝產量，以及挖渠引河等水利工程來拓展空間成為這一時的典型情節。以上可視為論述的第一階段（二、三節）。問題的複雜性使我不得不在第二階段（從第四節開始）把論述的話頭重新拉回起點，因為「增產」話語的複雜性在於，它既有可能來源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也有可能來自於社會主義，實際上它並不具備不證自明的合法性，需條分縷析、抽絲剝繭。

在這一時期，政治運作方式與文學寫作實踐之間有特殊的關聯，文學充分表達了政治的訴求，同時也成為政治的一種表達方式。二者互相滲透、摩擦、調整，也許還有一些衝突。把文學放置在斑駁的政治—歷史語境中，對其進行「症候性閱讀」，可發掘那些沒有直接顯明的東西。「症候性（symptomatic）閱讀」是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解讀馬克思《資本論》時提出的文本批評方式：

「把所讀的文章本身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並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繫，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必然的不出現存在於前一篇文章中……在新的閱讀方法中，第二篇文章從第一篇文章的『失誤』中表現出來。」³ 本文通過「對讀」1949-1966 期間農村題材小說，把某些小說中被掩蓋的東西（或敘事上的失誤）揭示出來，讀出原文中的空白、沉默與失語，進而「在另一種材料上找到相應的問題」。⁴ 第四節（探討從土改小說到合作化題材的語境轉變如何影響小說創作）和第五節（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小說中「運氣致富」的敘事模式，及「地主、富農」與「新中農」形象差異的分析）均體現了這種解讀路徑。

二、增產與勞動「競賽」

我們的討論從啟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一句話切入，它體現了「現代」的財產起源論：⁵

那個圈住土地的人從十英畝土地中掙得的收穫，超過了那些躺在荒野中的一百英畝土地，真可以說，是他饋贈了人類九十英畝土地。由於他的耕作，他從這十英畝土地裡榨取的供養，至少相當於自然界中的一百英畝土地所能產出的產品。⁶

按照這個觀點，衡量財富增加的標準便不再是所占土地的擴大，而是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洛克把「勞動」（實際上是生產效率）當作財

³ 〔法〕路易·阿爾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爾著，李其慶、馮文光譯，《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21。

⁴ 〔法〕路易·阿爾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爾著，李其慶、馮文光譯，《讀《資本論》》，頁21。

⁵ 錢永祥，〈自由主義如何看到了「底層」——讀邁克爾·弗里登《英國進步主義思想》有感〉，《讀書》2019年第7期（2019年7月），頁51-61。

⁶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94.

產權的根據，誰使土地產出更多財富，誰才擁有土地佔有權。同樣是差不多大小的土地，但勞動效率的提高會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才是合法性的真正來源。

一言以蔽之，增產才是硬道理。⁷ 洛克的這句話，至少在這一點上，具有合理性。如果我們把它放在 20 世紀 50 年代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去看，⁸ 就會發現它的微言大義與切中肯綮之處。增產的必要性在於，一定時期內的土地存有量不會有大的波動，但土地所承載的人口卻在不斷增加，土地的人均佔有量和產出量則相應遞減。這一趨勢在不同朝代的中興—衰落階段反復上演，它導致兩個結果：從微觀的、個體層面看，是不同農戶間貧富差距的逐步擴大，進而發生土地

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剛結束完土改運動，毛澤東（1893-1976）便批示「立即轉入生產、教育兩大工作」，參見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35。在1953年出臺過渡時期總路線前期，毛澤東又發文強調「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參見毛澤東，〈解決「五多」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79。茅盾（1896-1981）則指出「增產」這一主題對文學創作的要求：「革命已在全國勝利。此後的建設事業千頭萬緒，而中心的一環則是增加生產……圍繞著增加生產這一中心，數不清的轟轟烈烈的事蹟正在礦山，在工場，在農村，天天在發生……每一件事都可以寫成一篇文章。時代在飛快前進，我們文藝工作者應當急起直追。」參見茅盾，〈略談工人工藝運動〉，《小說月刊》第3卷第1期（1949年10月），頁4-7。

⁸ 何謂「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關於這一政治運動的準確含義，請參看195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官方解釋：「根據我國的經驗，農民這種在生產上逐步聯合起來的具體道路，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就是集體農莊）。這種由具有社會主義萌芽、到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就是我們黨所指出的對農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上冊，頁215-216。

兼併，出賣赤貧勞動力等現象；從宏觀的、國家層面看，土地產出的邊際效應在人口總量的峰值處開始衰變，而每每瀕臨臨界點的時刻，通常是帝國命運的轉軌之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單位畝產量的增加就十分要緊，糧食的增產與人口的增加呈現出競賽的狀態，前者勝出便可以稀釋人口密度提升所帶來的壓力，甚至可以紓解岌岌可危的政權危機。

處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階段的新問題在於，土地集體化後，按照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產和分配方式，從理論上泯滅了個體之間貧富差距的可能性，但緊接而來的是更為嚴峻的政權與制度的「合法性」問題：嚴密的現代性想像無法避免人口總量上升所導致土地產出量的邊際效應遞減，而且，土地兼併、勞力買賣這一自發的傳統調節管道也被堵死，在這樣的壓力下，貧富差距的消失，更有可能以「均貧」而非「均富」的面目出現。⁹

國家對農村（和城市）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嚴密、完備的管控體系，¹⁰ 把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等管理功能集於一身，實現了「黨政一體化、議行一體化、政經一體化、政法一體化、政社一體

⁹ 「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會主義都主張公有制。應該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從來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聯繫的，摒棄公有制就無所謂社會主義。但以往的社會主義思想都在低下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考慮公有制，幾乎都是主張貧窮的社會主義。」胡繩，〈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日報》第5版，1994年6月16日。

¹⁰ 參見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錢理群，〈反右運動前後（上）：1956-1958年初〉，《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13-172。錢理群，〈1953-1974——兩位同齡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的歷史考察〉，《1949-1976：歲月滄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97-340。錢理群，〈1956-1960——顧準的思考（上）〉，《1949-1976：歲月滄桑》，頁667-708。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潘家恩、張振、溫鐵軍，〈「鐵鉤」與「豆腐」的辯證——對梁漱溟20世紀50年代思想張力的一個考察視角〉，《開放時代》2018年第2期（2018年3月），頁7、99-117。

化」，¹¹ 以農業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為主體的組織形式，「將農村勞動力從生產到流通、分配、消費、生活全面控制起來，甚至形成人身的依附；用戶籍制度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禁止城鄉流動」。¹² 這一整套管控機制愈是緊密，當某種潰敗發生時，來自農村的反彈和報復就會愈熾烈。昔日農民的重負，如今加諸「國家」的肩上，因為「國家」直接出面參與了土地的分配與再分配（「土改」與「土地集體化」），土地所有權不斷轉換的過程所蘊含的全部暴力因素詮釋了一個事實：國家與農民之間不再有柔性緩衝機制，他們的關係前所未有的直接：「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制度變遷的模式主要是一種強制性制度供給……國家主義權威是鄉村社會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¹³ 這種由傳統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狀況是任何朝代都不曾面臨的。它深深形塑「國家」這個抽象政治體在農民心中的模樣，也考驗著農民眼中的「社會主義」（它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意志）之有效性。¹⁴ 這便是合法性危機的來源。

應在如上歷史語境中，來體會劉澍德（1906-1970）中篇小說〈橋〉（1955）中的農民對所謂「翻身」的樸素理解：「大家一年苦到頭，還是少吃無穿，你說說，翻身為的是哪樣？」¹⁵ 如果生活水準提升不了，農民辛苦依舊，把汗水揮灑進土地，疲憊加增，糧食卻更少了，這樣的政策不具合法性。在一批有關農業集體化的官方文件中，包括

¹¹ 轉引自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頁 66。

¹² 錢理群，〈1956-1960——顧準的思考（上）〉，《1949-1976：歲月滄桑》，頁 696。

¹³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439。

¹⁴ 有學者認為，在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改造中，農民的參與是「動員型參與」，「倒政治參與」，「被捲入」，缺乏自覺的觀念意識和行為選擇。李里峰，〈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1945-1976 年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解釋框架〉，《江蘇社會科學》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 2 月），頁 218-230。

¹⁵ 劉澍德，〈橋〉，收入孔羅荪、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 年），頁 5。

毛澤東本人的講話與文章，流露出了對生產效率的關懷：

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保證農業生產力的增長，並且在事實上證明合作社比較單幹戶以至互助組有巨大的優越性。¹⁶

提高生產率，比單幹要多產糧食或多產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員的收入，這是檢查任何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的工作好壞的標準。¹⁷

如果我們沒有新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共產黨走沒有意思，分了土地還是窮，他們為什麼要跟你走呀？¹⁸

用本身的制度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證明它比單幹與互助組優越……這樣來吸引廣大農民群眾傾向社會主義。¹⁹〔以上引文粗體字型為筆者所加〕

增產在這裡具備了政治隱喻的意涵——它總與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等話語相連，前者指向後者，帶有現實的強目的性：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推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生產合作社組成的基本條件，就是把社員分散經營的土地聯合起來，加以合理的和有

¹⁶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收入于建嶸主編，《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卷2，頁1171。

¹⁷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收入張培田等編，《新中國法制研究史料通鑒》（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卷5，頁4967。

¹⁸ 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96-197。

¹⁹ 〈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收入于建嶸主編，《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卷2，頁1155。

計劃的經營」，²⁰ 這句話明示了農業合作化的核心是空間的運作，而對空間的佔有和運用毋庸置疑是一種政治行為。

於是，我們便發現了增產的另一面深沉涵義：不僅僅是糧食增產，還有基於糧食之上的社會主義空間政治資本的增殖。「糧食」（具象的實物）與「空間政治」（抽象的話語）從一開始就被綁聯在一起，毋寧說糧食的增產證明了話語的有效；反過來看，又仿佛是話語「獎掖」或「饋贈」了農民增多的糧食。當社會主義空間政治滲透進糧食的收穫時，農民那千百年來的播種動作具備了某種政治神學的意味：種子在經歷新的空間組織方式（丈量、分割、合併、集體再分配）改造後的土地裡發芽，與此同時，新的空間政治話語在農民的心田裡生根。

在以上背景下，可更深地理解農村題材中關於勞動「競賽」的系列情節。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中明確鼓勵勞動競賽：「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採取各種辦法，充分地發揮有組織的共同勞動的優越性，開展勞動競賽。」²¹ 所謂勞動競賽，比拼的當然是產量，其關懷所至最終還是落腳在增產。

勞動競賽有兩種，一種合作社內部比賽，多屬友誼賽；更重要的一種是合作社與單幹戶之間的比賽。官方的提倡也反映在農村題材小說中，《山鄉巨變》（1958）專有一章就叫「競賽」，發生在單幹戶菊咬筋與合作社之間：

太陽把寒氣驅盡，霜冰化完，人們又使勁地挖，霸蠻地挑了。是吃力的勞動……但在菊咬筋，雖說嘴裡打了退堂鼓，實際還是繼續使暗勁，跟社比到底，而且堅決要在幹勁和畝產方面把

²⁰ 〈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收入于建嶸主編，《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卷2，頁1262。

²¹ 〈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上冊，頁481。

社員們比下播臺。²²

「農業社的優越性就在這裡了，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聽見後生子們七嘴八舌，菊咬筋氣得臉都發青了，但還是一聲不響，只管挑他的。社員歇氣的時候，他不歇，還是挑他的。²³

此類競賽是個人的腕力與國家的腕力之間的比拼，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味，用作者的話說，這其中有「政治攻勢的火藥氣」。²⁴ 被著力凸顯的是農業合作社的集體優勢，比如人多力量大，可輪流換班等等，競賽的結果是無懸念的。但作者依舊把競賽的過程寫得驚心動魄，尤其是王菊生焦急、窘迫的心理，其妻子和女兒的無助感、疲憊感：

王菊生也起著小跑，看見堂客女兒都跑不動了，他急得口裡亂罵：

「死豬子，不快迅點，要在這裡過年啵？」

「爸爸，實在是走不動了。」金妹子向父親告饒。

「只曉得築飯的傢伙。」

「腳後跟打起一個泡來了。」金妹子挑著擔子，一拐一拐地走著，眼裡含著淚水說。這一回是跟媽媽講的。

「那你就回去，莫在這裡出俗相。」菊咬堂客維護女兒。她自己腳上也起了泡，腦殼還有一點昏。

「你們這些夜豬子，何不一個個給我瘟死？都只曉得吃現成。」看見女兒回去了，堂客一拐一拐地，像一名傷兵，菊咬筋發了躁氣。²⁵

²² 周立波，《山鄉巨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48。該版據195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鉛印本重印。

²³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351。

²⁴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349。

²⁵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350。

他們換班了。菊咬堂客想回去，但是看到男人已經下塘了，自己也得卷起褲腳。他們遠遠地離開汽燈，害怕再次遇到孟春一樣的冒失鬼。約莫挑了一點鐘，菊咬堂客上好一挑黑泥巴，才擱到肩上，忽然覺得遠處的汽燈好像在飄動，接著眼前一陣黑，扁擔一滑，她栽倒了，連人帶擔子滾進爛泥裡。²⁶

毛澤東提到這類勞動競賽所能帶來的政治紅利：「合作社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到同這些富裕中農的單位面積產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們感到再單幹下去在各方面都對他們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較為有利的時候，他們才會下決心加入合作社」。²⁷ 競賽凸顯了合作社的土地組織方式的效率優勢，它也是杠杆的支點，撬動的是傳統小農的空間應用與組織方式。²⁸

競賽所展開的對抗不是從空間本身產生的，而是從空間的制度差異和實踐應用中產生的。有研究者指出，「以『競賽』而不是『鬥爭』來完成這一群眾的自我改造，也可看出一種政治乃至文化上的自信。」²⁹ 《山鄉巨變》中競賽情節的可貴處就在於這種不疾不徐的自

²⁶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 352。

²⁷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178。

²⁸ 它的另一種表述是「走資本主義的自發道路」。「資本主義道路」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文學文本和政策文本中，但本文在這裡還是採用「傳統小農」，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優秀嚴謹的歷史學、人類學著作同樣採用這樣的觀點，如：林耀華著，莊孔韶、方靜文譯，《金翼：一個中國家族的史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莊孔韶，《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另一部分原因是這裡的「資本主義」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更是一種區別於「社會主義」的差異性說法。小農經濟，相對而言，與現實更為接近。其實，無論是「傳統小農」，還是「資本主義道路」，主要是能指上的區分，它們所要凸出的是土地的私有制。

²⁹ 蔡翔，〈動員結構、群眾、幹部和知識分子〉，《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第2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 97。

信，敘事者調用寬容的敘事情感、從容的敘事節奏，不取戲謔、嘲笑的态度來對待單幹戶，對競賽雙方都葆有厚實的溫和態度，比如在勞動競賽之前，謹慎的劉雨生表現出對對手的敬重和讚賞。小說並沒有過濾掉一些柔軟的溫情，清溪鄉的色調也是暖的，在堂客昏厥的前一瞬間，敘事者讓她看到的最後一幕場景是「遠處的飄動的汽燈」，接著她便昏沉沉地摔倒了。這汽燈在「遠處」飄動，此時此刻來自遠方的安寧、憩息似乎是疲累的她的最大嚮往，她以抽空的體力擁抱了這遠處的生活；但這「汽燈」更可能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欣欣向榮的永不熄滅的象徵性光亮、是社會主義改造的轟鳴進程中一道氤氳的提引性光芒——競賽中的沉重與輕盈就這樣於一霎時統一起來。

周立波（1908-1979）在《山鄉巨變》中的整體筆調不似《暴風驟雨》那般決絕、冷酷，這是別一種風格化的體現，他對人性的決斷力和豐富性葆有敬畏心，在疾風驟雨的階級鬥爭與個人、國家之間的腕力比拼時，作者依舊可以勻出筆墨在字裡行間的罅隙中敷衍點染一個鄉里世界。

三、從「空間內的生產」到「空間的生產」

（一）密植、雙鐮犁與新式稻種：空間策略

糧食的增產，是在框定的空間內部元素的自我繁殖，與增產相關聯的，除了競賽，還有一系列的勞動策略與技術——它們都是「空間內的生產」（produce in space）。〈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 1952 年農業生產的決定〉中就提到，引導互助組將剩餘勞動力投入精耕細作、土地改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上面以擴大生產。³⁰ 1956 年鄧子恢

³⁰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 1952 年農業生產的決定〉，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上冊，頁 54。

(1896-1972)在報告〈一年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中也說：「在合作化以後都注意進行耕作制度和耕作技術的改革，如變單季為雙季，變旱地為水田，變稀播為密植，以及選用良種，改用新式農具等，這是保證農業增產的正確的重要的措施。」³¹ 這反映了農業政策對新技術、新農具的擁抱，進一步反映的是對增收的嚮往。

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復種面積、採用良種等情節遂廣泛出現於農村題材小說，新式農具如雙鏵犁也頻繁出現，成為有政治覺悟的農民的關懷。從表面來看，它們都是勞動策略和技能，但就其更深層的意義來說，更是針對「空間」的策略：通過疊加、複製、稠密等一系列策略實現對有限空間的榨取，以提高生產效率與單位畝產量（這本是就是一個基於空間尺度的概念）。為了形象說明，我們舉一個例子。《創業史》（1959）中，梁生寶進城買稻種，老農任老四如此說：「寶娃子！你這回領著大夥試辦成功了，可就把俺一畝地變成二畝囉！」³² 這句話貼切地反映了新良種是如何與空間的複製發生關聯的。如此看來，《創業史》中，農技員韓培生駐進下堡鄉就是一件大事，他帶來的是科學的播種技術，也即科學的土地利用技術。韓培生是從省農技學院培訓出來後，被派遣到下堡鄉，這個情節表現了如下實施，即合作社作為國家意志實踐的產物，自然會獲得國家的技術支援。1955年1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中有一段關於「新技術、新工具」的文字：「農業生產合作社要盡可能地使用進步的農業生產工具，不斷地改進

³¹ 鄧子恢，〈一年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上冊，頁559。

³² 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頁85。《創業史》有四個主要版本，分別為「初刊本」，發表在《延河》1959年4月號至11月號。「再刊本」，發表在《收穫》，1959年第6期。「初版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以及「再版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本文引用的是「初版本」。

農業技術，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³³

在這一時期的農村題材小說，新式農具，尤其是雙鐮犁是一個帶有時代徽章的意象，³⁴ 劉紹棠（1936-1997）的〈擺渡口〉（1952）便提到了「合作社的農具」（新式步犁），它帶來的新奇性和訝異感註定產生一種政治誘惑，小說角色青林甚至表現出生理的本能反應：「扒著車廂一看：新式步犁，手搖鋤草機，收秋用的鐮刀蓆箕；青林饞得吐舌頭，看個不夠。」³⁵ 在李準（1928-2000）的〈冰化雪消〉（1956）中，也多次出現了雙鐮犁這個工具意象，著重突顯其生產的優越性：「紅旗社有兩張雙鐮犁，現在他們二遍地已經犁完……我親眼看過人家一天能犁十幾畝，頂咱們三張犁用。」³⁶

張樂天認為「公社時期引進了大量農業新技術……這一切不僅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改變了農村的生活本身，而且有利於農民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外界的新事物」。³⁷ 這同樣也適用於「選用良種」。比如前文所提的梁生寶買稻種的例子，其實就是引進一種叫「百日黃」的優良稻種，縮短稻種的生長週期，高效利用土地，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糧食產量。《山鄉巨變》中，也以雙季稻為工具體現了集體化的優越性，「雙季稻」成為時代意象和南方農村題材的重要座標，它總是與農業

³³ 〈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第20號（1955年11月28日）。

³⁴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掀起了一股使用『雙輪雙鐮犁』的熱潮。國家在農業發展綱要中計畫，要在三五年內，製造600萬部這樣的犁向農村推廣。」張檸，〈鄉村器物之二：農具〉，《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利分析（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4。

³⁵ 劉紹棠，〈擺渡口〉，收入中國作家協會編，《一心入社》（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頁2。

³⁶ 李準，〈冰化雪消〉，收入孔羅荪、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卷）》，頁345。

³⁷ 張樂天，〈村隊場景：革命表象下演繹的傳統——以20世紀70年代浙北聯民村為例〉，收入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516。

合作社沛然貫通，利用了人力—時間—空間三者之間的辯證法：雙季稻生長週期短，節省了時間，正是由於播種與收穫的節奏加快，又需更多的人力投入。所以，雙季稻、百日黃等稻種作為「工具意象」在小說內部頻繁出現的同時，攜帶著的是合作社人力資源的優勢：「雙季稻是兩季工夫，擠在一起，要搶火色的，你一個人忙得過來？人家入了社，你零工子都請不到手了。」（《山鄉巨變》）³⁸「不辦社，哪一家也沒得力量插這樣多的雙季稻。」（《禾場上》）³⁹

密植技術更是交集度最高的素材之一。「密植」兩字與空間密度有關，旨在提升單位面積的產出量，是空間策略之一種。劉紹棠的〈運河灘上〉（1953）就是一篇關於農民對密植技術的猶豫、接著被其優越性征服的小說，毫不意外，在小說的結尾，合作社的密植技術頗獲成效，改造了保守的農民，並與往昔產量形成對比。方之（1930-1979）的〈浪頭與石頭〉（1956）中，甚至出現「毛主席」，徵用最高權威肯定密植技術，達成了文本內外的互證迴圈。⁴⁰

以上小說是共時性的寫作文本，寫作行為和當時的農業政策具有同時性。但是，我們作為後來者，帶有審視的時光距離，似乎可以看清一些事實。如何看待上文出現的新技術、新工具、新良種、新的種植法？小說文本——作為歷史文獻的一部分——的確呈現了一些新元素（新技術、新工具、新良種等等），怎麼看待它們是我們此刻應該面對的問題。

對這一歷史現象（即新技術、新工具、新良種等的出現），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其切入角度也不同，得出的結論幾乎相反，這悖反值得留心。其中一種解讀來自文學研究者：

³⁸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 87。

³⁹ 周立波，《禾場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 年），頁 90。

⁴⁰ 方之，〈浪頭與石頭〉，收入孔羅荪、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卷）》，頁 189。

它們卻無意識地流露出一種對「現代」的憧憬或者嚮往，以至於毫不吝嗇地將這些「文明」之物納入革命的「現代」譜系之中。……在這樣一些敘事中，敘事者更多關注的是物的現代屬性……因此，所謂的「物質豐裕」，在其敘事背後，帶有明顯的現代性支持。⁴¹

在這裡，研究者把各種新技術與「現代性」聯繫起來，但這是一種基於「話語」（這裡表現為小說文本的敘事話語）的解讀，是建諸「第二文本」的解讀。但問題在於，作為解讀與分析地基的小說敘事文本（飽蘸激情、理想主義、樂觀精神、對政策的高度演繹等等）是否具有支撐的資格？我們是否可以依靠它做溢出文學範疇、觸及社會科學層面的分析，進而得出結論？

「一個人只有從其他資料而不是從純粹的文學作品中獲得有關某一社會結構的知識，才能發現某些社會形態及其性質在小說中的重現程度……哪一些是屬於幻想，哪一些是對現實的觀察，而哪一些僅是作家願望的表達，等等，在每一創作實例中都必須以精細入微的方式加以區分。」⁴² 因而，有必要引渡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學解讀作為視野的補充：

公社面臨著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的新的挑戰，傳統的農業技術在新的挑戰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它既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也無法吸納更多的勞動力。生產隊需要新技術，這種需求與其說是出於對農業現代化的渴望，不如說是為了解決最起碼的吃飯問題和勞動力出路問題。……我們稱這種情況為過密集型技術

⁴¹ 蔡翔，〈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衝突〉，《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第2版）》，頁332-333。

⁴² 轉引自〔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丁·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新修訂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93。

偏好。過密集型技術的偏好導致了過密集型技術的引進和迅速推廣。⁴³

這種解讀紮根於史料和細密的田野調查，以至於顯得過於「現實」、「務實」，而不夠「深刻」。在這裡，以密集型技術為典型的新技術背負了現實的沉重，是一種倒逼的結果。該解讀也將我們的論述引向下一個環節，正是因為人口負擔和土地空間的有限性所帶來的雙重壓力，我們看到了這一時期小說中同樣顯眼的空間之改造、擴增與生產。

（二）打井開渠、興修水利：「空間」的生產

無論是密植技術，還是新農具的使用，良種的引入，它們多聚焦於空間內部的生產，但空間本身的生產也一樣重要。何謂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具體說來，小到打井開渠（《三里灣》展現了與此相關的空間協商過程），大到興修水利（駱賓基〔1917-1994〕的〈父女倆〉，劉紹棠的〈修水庫〉，丁玲〔1904-1986〕的〈「糧秣主任」——官廳水庫之一〉等）、土地連片（幾乎所有土地集體化題材都會涉及到），它們都屬於「空間的生產」：旨在改造舊有空間結構，並擴增新的空間。

其實，空間內的生產與空間的生產，二者是有因果關係的：「在人均土地資源和技術保持不變，以及集約化程度已經很高的條件下，生產組織規模的擴大並不能達到規模生產的效應，因而無法增加原有土地的單位產量，但是，正是憑藉集體組織的力量，才使得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成為可能。細碎分割且高低不平的田地得以平整連片，水渠道路整齊劃一，這使得陸續引進的新作物品種、農藥、化肥

⁴³ 張樂天，〈公社農業經營（上）〉，《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頁 236。

以及機械得以有效地發揮作用，從而使單位畝產和復種指數得以提高。」⁴⁴ 梁漱溟（1893-1988）也曾指出水利工程對密植、深耕、良種、新農具和新技術所起到的前提性作用：「水利工程最具有關鍵性。沒有它，不是旱，就是澇，什麼深耕、密植、加肥一切皆無用。有了它，就能保收，而後深耕、密植、加肥、防病、除蟲、育種……恰在大搞水利的同時盛倡深耕、密植，而深到那麼深，密到那麼密，恰又非是人力集中辦不到。於是一連氣把種種從來辦不到的事就隨著都辦了。這就是農產量能以陡增猛長震驚一世的由來。大搞水利，大搞深耕，大搞密植、大搞加肥，這一系列的大施工實在應當統起來作一回事看。」⁴⁵ 可見，空間內的生產與空間的生產二者利害攸關，統籌於一個系統之內。

〈關於 1956 年—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說明〉強調了土地大規模的集體化改造與生產：「合作起來，土地聯片，去掉田畔地界和多餘的田間道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積。合作起來，就有可能大規模地興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壤，變旱地為水地，把瘠薄的土地和廢棄的土地變成肥沃的良田。」⁴⁶ 「合作起來」是關鍵詞，打破私有空間的重重邊界，將土地連片，進而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展開諸如興修水利等大的空間工程，而灌溉等水利技術的普及，又會進一步增加耕地面積。

土地集體化就這樣展現了對空間統籌規劃的效率優勢，⁴⁷ 它是緊

⁴⁴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農業：組織、生產與分配〉，《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頁 108-109。

⁴⁵ 梁漱溟，〈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收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457。

⁴⁶ 轉引自韓丁，《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 112。

⁴⁷ 但這種規劃與動員的效率優勢從試錯的範圍、成本來看，同時也極有可能是劣勢。這是應

接著土改而來的國家動作。梅斯納 (Maurice Meisner, 1931-2012) 從空間的角度注意到了土改的經濟效益某種程度上被它產生的新的經濟問題抵消了：「土地的再分配導致一大批細碎耕作空間的出現，田地更是被普遍分割 (greater fragmentation)，這反而壘高了傳統小農時代的生產力壁壘」，⁴⁸ 「小塊土地的分割不利於引進更高效的作業結構 (work patterns)，也阻礙了現代農業技術的採用，它嚴重地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⁴⁹ 而農業的合作化運動剛好因地制宜，合併土改所導致的細碎土地，對空間進行高效地重新編排、佔有、書寫和塗改，生產出整齊劃一的空間材料。

劉紹棠的〈修水庫〉(1952)的主題便是圍繞空間的生產這項「巨大的工程」展開，全民鼓足幹勁兒興修水利。《豔陽天》(1964)中，蕭長春說服中農馬子懷的說辭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大的空間調配、改造與新技術的引進描畫了一幅充滿誘惑的綜合圖景：

從遠處看呢，咱們農業社還要大大提高產量哪，我們要讓它一畝地長二畝、三畝地的糧食！怎麼說呢，河水說話就引過來了，鹽鹼地咱們秋後要運沙土改造它，咱們要用新式農具，還要使拖拉機。農業社有這個力量，還不增產嘛！你單幹，要了命你也不能把河水引過來呀，傾了家你也買不了一架拖拉機呀；就算買得起，一家一個拖拉機，你那十五畝地，半個鐘頭耕完了，還幹什麼用呀！⁵⁰

「挖渠引河」在駱賓基的〈父女倆〉(1956)中起了重要作用。

當被留意的。

⁴⁸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100.

⁴⁹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p.130.

⁵⁰ 浩然，《豔陽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頁 505-506。

〈父女倆〉標誌著作者在 1949 年後創作所達到的最高藝術水準，⁵¹ 促成這篇小說的一個直接現實原因是，作者親身經歷了沂蒙山南導流整沂的水利工地建設活動：「將流河攔腰截斷，用人工開一條十七華里長的引河將其引入東海，解除蘇北五百萬畝土地的災害」，⁵² 這項工程牽涉十萬民工，駱賓基成為這項熱火朝天的建設盛事的近距離觀察者，進而才有機會將其藝術個性、個體思想和創作意識映射到空間書寫的層面之上。

駱賓基善於從獨特的角度，在一個嚴格限制的時空內，用生活細節組織矛盾衝突，塑造人物形象，表達主題思想。這篇小說中的「流河改道工程」正好成為了敘事的一個契機。該故事有兩條線索，一條是女兒香姐與父輩的代際衝突，以及與共產黨員張達的情愛故事，另一條就是挖渠引河的展開。前一條是私性話語（個人生活史），後一條則是國家敘事。水利工程的展開保障了前者愛情故事的圓滿，個人生活的曲折顛簸也經由國家意志的介入發生改觀，這種介入，恰是空間改造帶來的：「兩個莊當中一開引河，她『心裡感到將要完全擺脫了官莊娘家爹的糾葛一樣，又是這樣的輕鬆。』」⁵³

的確，空間生產的過程也是權力重新動員和調配人口的結構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不可避免地被再生產出來：「空間裡瀰漫著社會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⁵⁴ 開渠挖河使香姐有機會衝破家庭與傳統的闕限，打破先前狹隘的空間格局，進入到更為宏闊的關係之中，

⁵¹ 駱賓基，〈我的創作歷程——為了悼念雪峰、荃麟和彭康等同志〉，《初春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06。

⁵² 謝淑玲，〈駱賓基建國後小說創作的心路歷程〉，《遼東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2013年12月），頁130-134。

⁵³ 駱賓基，〈父女倆〉，《人民文學》1956年第10期（1956年10月），頁91。

⁵⁴ 〔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收入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48。

香姐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水利工程的積極分子活動。

該文發表於 1956 年，是時，文藝「雙百」方針的宣佈使駱賓基有了擺脫極「左」思潮束縛的機會，可以暢快抒發藝術的激情，一展自己所擅長刻畫的小人物形象及其內心世界之特長——這表現在香姐那充滿生機的全新眼神之中：「在她的兩只烏黑嬌柔的眼睛中，現出一種獨立的自由的豪爽氣來」，⁵⁵ 它集中體現了大的史詩事件與個人生活情節的交錯與融合。挖渠引河這一空間工程也使油莊集的整體面貌發生改變，引起一系列的空間連鎖反應：油莊集由魚龍混雜、物質紛繁的消費空間（集市）變為了欣欣向榮、淳樸單純的生產空間（農業生產合作社）。空間一躍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證詞，極大地突破了原有的私有邊界，更直接地參與到了集體化的國家話語之中。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內在結構性問題。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往往體現在開荒、開渠、興修水利等大的空間工程上，體現在搶種、搶收等時間的爭取和人力資源的調配上。小說在展示合作化的優越性時，也多以這種緊張、激烈的「大」題材作為描寫對象。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或許是從空間闡釋的角度切入農業合作化題材所能回饋的一個問題，即集體化運動對大空間有操作優勢。

1959 年初，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0 周年之際，梁漱溟寫了〈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一文，對共產黨領導各項建設事業的成就熱烈稱讚，喜於言表。⁵⁶ 該文核心論點之一在於社會主義具有的資本主義所缺乏的優勢：一方面「集中領導，統一規劃」，另一方面啟發群眾的自覺性與積極性，克服農民的散漫性格。

請留意梁漱溟下面一段話中土地所扮演的角色：「當時農業合作

⁵⁵ 駱賓基，〈父女倆〉，《人民文學》1956 年第 10 期（1956 年 10 月），頁 93。

⁵⁶ 梁漱溟，〈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收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頁 415-522。

社高級化，土地歸於大集體所有之後，來了大規模的耕作，來了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要求如何節省人力，特別是要求減輕人們那些笨重的體力勞動而代之以機械。於是許多工具改革在耕作中在工程中亦紛紛自然出現於各地。」⁵⁷ 梁漱溟尤為看重農民散漫性的被克服和集體性的養成，「對於五億多農民來說，除非在生產上和生活上循序漸進地從散漫入組織，形成集體，是無其他巧法能讓人力集中起來的。」⁵⁸ 魯迅（1881-1936）當年曾在〈文化偏至論〉中用「沙聚之邦」形容他的批判對象，這「一盤散沙」的舊中國，⁵⁹ 在上文所述的一次次大的空間生產過程中逐漸凝聚成一個「新中國」。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一個優勢」，當這種先天優勢附魅於共時性的文學寫作時，宏大空間工程自然而然地被編織出來。合作化運動與人力的調配、空間的切割、合併、改造、生產等等具有固有的關聯，小說也相應地呈現了這種關聯。

但是，所有規模宏大的空間生產都有個限度，換言之，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發現，土地集體化在處理小單位的「精耕細作」時，總會顯得捉襟見肘，合作社的優越性反而不易體現，而在小說中，情節衝突會在這類空間內展開。《山鄉巨變》的作者認為該小說的一個中心線索是「新與舊，集體主義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銳、但不流血的矛盾」，⁶⁰ 小說在展現這一矛盾時的真誠之處在於，它並未回避合作社所面臨的挑戰，使讀者窺見合作化運動展開過程中的歷史複雜性。當作田好手菊咬筋暗暗地與農業社比賽時，社長劉雨生卻展現出了不自

⁵⁷ 梁漱溟，〈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收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頁 445。

⁵⁸ 梁漱溟，〈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收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頁 456。

⁵⁹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 55。

⁶⁰ 周立波，〈關於《山鄉巨變》答讀者問〉，《周立波選集·第六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 526。

信的心態，這在其它同題材小說中是很少有的：「看樣子，我們會輸在他的手裡。」⁶¹ 當陳孟春自信地說農業社「人多力量大」時，劉雨生的下面這段話便表現出農業合作社的典型癥結：「他又不跟我們比人多，只比幹勁，比畝產。他田作得肥，如今又在改造乾魚子腦殼。我們的田肥瘦不勻，畝眼子，乾田子，又非常之多，改不勝改。」⁶² 「比畝產」，這是一個關鍵的空間意象，小的單位空間產量在這裡成為一個重要的尺度。周立波接著寫道：「劉雨生的這席話，把孟春說得啞口無言。」⁶³ 從這個角度講，當吹拂去宏大空間的生產所散發的暫時的熱力與激情，合作化運動並沒有內在地改變農業的傳統經濟形態。

四、曖昧的「勞動」：從土改小說到合作化題材

需要適時提醒的是，上文的討論是從洛克談論勞動效率與土地關係的一句話切入的，我們具體分析了「增產」那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正當性、必要性及其附加的政治涵義，並進一步分析了土地內部的增收和土地與土地之間的聯合與擴增。

這一部分要回過頭來更深地思考洛克的那句話——它實際上暗含一種根源於啟蒙時代的資產階級勞動-財產觀（容下文詳述）。當深入農村小說題材時，讀者會與此觀念不斷邂逅。與這種觀念形成對位的是另一種勞動-財產觀，依照這段時期的文學文本與政策文本的語境，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財產觀。

它們二者是如何糾纏在文學文本中，又是怎樣進行緊張的對話、甚至是鬥爭？它們在文本中的對峙也是文本外更廣闊的意識形態戰

⁶¹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 339。

⁶²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 339-340。

⁶³ 周立波，《山鄉巨變》，頁 340。

場上的對峙之鏡像。這兩種觀念在「文本」與「現實」各自的內部中不斷對話；有意思的是，基於二者（資產階級勞動—財產觀與社會主義的勞動財產觀）間纏繞與鬥爭的關係，「文學」與「現實」之間也會進行對話，（優秀的）作家就是在意識形態、現實生活、文本創作與自我探求的四重角力下持續緊張地思考，這力度不同的四重力量所形成的合力營造出一個不固定的四邊形，不同作家的不同文本就在這變動不居的尺寸間呈現不同的風景。

如上文所述，洛克把「勞動」當作財產權的根據，勞動可以將原本屬於人類公有的事物轉換成私有財產，誰使土地產出更多財富，誰便合理地擁有土地的佔有權。這樣洛克便把「勞動」與「財產權」掛起鉤來。⁶⁴ 錢永祥認為：「表面上這是一種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洛克並沒有從此推出勞動者有資格享用勞動的果實，或者因此便有權利要求獲得什麼樣的待遇；相反，由於勞動者身無恆產，所以根本不能享有政治權利。」⁶⁵ 而且，洛克也忽略了「起點正義」和「獲取的正義」，⁶⁶ 即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土地、那個可以給勞動提供機會的土地，在最一開始，究竟是如何獲取來的？⁶⁷

因此，我們更應該看到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洛克那句話的歷史

⁶⁴ 「勞動既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又是社會批判的出發點，這一理念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批判理念。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洛克的著作中，並且在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中得到了最嚴謹的表達。」請參看〔加〕莫伊舍·普殊同著，康凌譯，《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再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61-62。

⁶⁵ 錢永祥，〈自由主義如何看到了「底層」——讀邁克爾·弗里登《英國進步主義思想》有感〉，頁56。

⁶⁶ 關於「獲取的正義」，請參看諾奇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尤其是第五章〈國家〉：Robert Nozick, "The State", in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88-119.

⁶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且稍顯尷尬的問題，在批判地主的土地原始積累時，「獲取的正義」被提了出來，但在土改時，按照諾奇克的理論，獲取的正義並沒有被遵守。其在故事層面的化解是——隨著講述故事的時代改變，在很多小說中，描述地主、富農、富裕中農的發家史時，大多採用的敘事模式是「運氣致富」。關於這一點，容下文細述。

語境——他是在為資產階級圈佔土地進行辯護。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以洛克為代表的觀點隱藏了嚴重的伏筆，因為生產效率是較為中性客觀的指標（如上文集中討論的糧食增產），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它既有可能來源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也有可能來自於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那就進一步追問，這樣的「勞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勞動？

在這裡，有意思的一幕出現了，「增產」並非是不證自明的政治正確，在《創業史》中，心心念念於自發道路的郭振山說出了這樣的話：「兄弟！共產黨對窮莊稼人好是好，不能年年土改嘛！要從發展生產上，解決老根子的問題嘛！」⁶⁸ 我們在此發現了「生產／勞動」的曖昧一面，它是以拒絕擁抱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保守面目出現的。

「勞動並不是『超歷史』的，相反，它具有一種特定的歷史形式，不可避免地聯繫著某一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並為後者所塑造，因此，對勞動的分析也應當是具有歷史特殊性的。」被洛克所稱讚的「勞動」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佔有關係下的「勞動」。當洛克宣揚「勞動」是財富的來源時，進一步貶低土地的價值就帶有了歷史必然性，下面這段話同樣出自洛克：「是勞動（而非土地本身）產生了事物價值的絕大部分，那些可產出物質資料的土地很難被認為佔有價值的任何部分，至多也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已。」⁶⁹ 「自然和土地就它們本身而言只提供幾乎沒有價值的資料。」⁷⁰ 按照洛克的觀點，這些土地本身不具備價值，是圈地者的「勞動」賦予其價值；進一步說，洛克真正的深意在於，第一個圈地者由此便擁有了該地的合法產權，這是洛克認為的私有權之第一步。⁷¹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點明其實

⁶⁸ 柳青，《創業史》，頁 80。

⁶⁹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297.

⁷⁰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298.

⁷¹ 「洛克把私有財產上溯到佔有的自然根源，強制地突破那些穩定的、『從公有』中『圈佔出

質：「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並且始終是它的基礎。」⁷²

有研究者指出，針對這種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經常宣揚的所謂「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馬克思一貫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駁。⁷³ 例如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⁷⁴ 在馬克思看來，是資產階級（地主）事先佔有（或奪走）了作為勞動資料的土地，在此情景下，無產者（農民）除了自己的勞動便一無所有。所以，無產階級要克服勞動與勞動資料的分離，就意味著要奪回他們失去的土地。

順著這樣的邏輯，我們會發現從〈地板〉（1945）到《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⁷⁵ 從〈邪不壓正〉（1948）到《暴風驟雨》（1949）等系列土改小說試圖呈現的就是爭奪空間的合法性之過程，它建諸關於勞動、剝削、資本（土地）等主題的論辯。

在《暴風驟雨》中，就有一段相關的論辯式演繹。從省城學習歸來的白玉山向妻子普及「剝削」的概念：「比方說：你收一石苞米，地主啥活不幹，乾要你三四斗租糧，這租糧是你勞動的果實，是你起

來』的世界界限。」參見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111.

⁷² 〔德〕卡爾·馬克思，〈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696。

⁷³ 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頁17。

⁷⁴ 〔德〕卡爾·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98。

⁷⁵ 嚴格說來，〈地板〉講述的是減租減息的故事，但其秉持的原則在大「方向」上是與土改一致的，區別在「量」而非「質」。

早貪黑，大汗珠子摔八片，苦掙出來的。」⁷⁶ 但是白大嫂子的回答卻是：「地可是他們的呀。」⁷⁷ 儘管白玉山把話說得明白，可是只要勞動-財產觀得不到質變，權力關係就沒有辦法得以真正改造。白玉山接下來的話則畫龍點睛：「土地也是窮人開荒佔草，開闢出來的，地主細皮白肉的，乾佔著土地。咱們分地，是土地還家，就是這道理。還有，光有土地也不成，你家沒有勞動力……管保你收不到半顆高粱。……房子，糧食，衣裳都是勞力造出來的。」⁷⁸ 趙樹理（1906-1970）的〈地板〉通篇借小學教員王老三之口給地主王老四普及「勞動價值論」，是佃戶們的勞動讓「荒山一處」變為可收穫糧食之地，地主家的「地板」本身並不能產生這樣的價值，這對於後者不啻於一場頭腦風暴。《暴風驟雨》的論辯是在農民階級內部進行的，〈地板〉的論辯則是在地主階級內部進行的，由此可見，無論是寫作作品的作家還是作品內部的農民-地主角色，都關注到了此主題。

但是，一個微妙的問題出現了，土改連同土改小說其實扮演了本時期農業合作化題材文學前史的背景性角色，⁷⁹ 進入 1949-1966，文學的關注點很快從暴力爭奪土地的合法性之論辯轉移到其它的論題

⁷⁶ 周立波，《暴風驟雨（下冊）》（天津：新華書店，1949年），頁161。

⁷⁷ 周立波，《暴風驟雨（下冊）》，頁161。

⁷⁸ 周立波，《暴風驟雨（下冊）》，頁162。

⁷⁹ 「土地改革」橫跨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50年代初期」這兩個時期。更確切地說，「土改」指的是1946年〈五四指示〉之後開始的土地改革運動。以土改為主題的小說多是圍繞1946-1949這一時期的土改運動。事實上，土改的「主體」也是前一時期。建國初期的土改運動主要針對的是新解放區，雖然新解放區的人口是老解放區的三倍之多，參見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1，但是由於先前的種種經驗和教訓，50年代初的土改運動持續時間相對較短，1952年便全部完成，此後，全國範圍內（少數民族居住區除外）便很快進入社會主義改造，並於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建國後的土改運動，一定程度上被後來轟轟烈烈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光環所遮蔽。這一事實在共時性的文學創作上也有所表現，1949年之後，農業合作化題材以壓倒性的優勢勝過土改題材小說，成為農村題材小說的主流，見陳思和，〈六十年文學話土改〉，收入胡星亮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5卷第2期（2010年11月），頁22-49。

上，⁸⁰ 而這個「其它的論題」便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隨著「講述故事的時代」切換，歷史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如果說土改小說所關切的，本質上還是空間私有權的佔有與分配；那麼，農業合作化運動所關切的卻是空間中生產關係的根本改變。⁸¹「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會產生出自身的空間。社會空間包含著生產關係和再生產關係，並賦予這些關係以合適的場所。」⁸² 與土地私有制的一切相關話語不僅不再受歡迎，而且還會受到批判。1951年《文藝報》的一篇文章〈關於「新事物」〉就反映了這個政治動態和形勢變化：「有些同志所寫的題材，卻還是落在現實生活的後面。他們還在重複早為一般讀者所熟悉的過時的題材：『一個翻身農民和他的黃牛』，『農民沒有了饑餓和寒冷』，『穿新衣，吃餃子』……等等。這些，從人民鬥爭生活的進展中看，顯然已經不能算是最先進的事物了。」⁸³

新事物、新題材、新問題和新的生產關係都在被呼喚著出現，⁸⁴

⁸⁰ 這一轉變出現的原因（歷史原因與文學內部的原因）陳思和在〈六十年文學話土改〉一文中從文史互證的角度做了精彩的論析，本論文已無必要再贅言。陳思和，〈六十年文學話土改〉。

⁸¹ 1953年，在黨內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時，毛澤東在〈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一文中，批判了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等各領域的資產階級思想傾向。他論及農業時，提到所有制變革：「我們應當按照自願的原則，把農民個體所有制逐步引導到集體所有制。」參見毛澤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93。而所有制的對象，首當其衝便是「土地空間」，所有制的改變亦是空間制度的改變。要明白的是，空間關係是空間持有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的一個外在形式。

⁸² [英]邁克·迪爾，〈後現代血統：從列斐伏爾到詹姆遜〉，收入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頁87。

⁸³ 志，〈關於「新事物」〉，《文藝報》1951年8月25日，頁32。

⁸⁴ 這種「新」的萌發或轉捩點，是從哪一年開始的呢？有研究者認為是在1953年。在這一之前，新新政權完成了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國民經濟的恢復、針對黨內的三反與針對城市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因此，1953年之後，才有「新」議題、「新」方向的可能性。錢理群認為：「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1953年是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建國初期的氣氛是相對輕鬆的，那是一個恢復時期，政治氣氛緊張起來是在1953年之後。1953年政權已經基本

但問題在於，「新」的訴求遠遠領先了處於「舊」的制度關係中的個人。在陳伯達（1904-1989）寫出〈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初稿後，毛澤東提議向熟悉農民的作家們徵求意見。陳伯達就將初稿拿給趙樹理看。趙樹理瞭解農民的心思，對這個草案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現在的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⁸⁵「首先起來反抗的是農民。農民剛分到土地，不願集體化，用一些老農的話來說，土地揣在懷裡，還沒有捂熱，就又要歸公，少說也是不習慣的。」⁸⁶

一些小說從否定的角度反映了農民的歷史心態：「我的五年計劃從五三年一直到五七年，現在，我挨年數給你聽：今年，五三年是第一年。我計畫存糧兩千斤，拴起一輛牛車，養兩口胖豬。到年底連趕車帶賣豬，加上糧錢，要存款六百萬。明年，第二年，春天小海來家上門，再拴起一輛牛車，養八口胖豬。栽秧後，賣出存糧，收買老蠶豆，冬天和陳傢伙開一個粉房。到第三年——五五年，春天，放出人

穩定，新中國已經立足，於是面臨著『如何建國』的問題，這是時代所提出的一個尖銳問題：中國該往何處去？也就是說，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這時就必須對『治國道路與模式』作出某種選擇。……真正顯示毛澤東的建國理想、治理特色的，是1953年以後。」參見錢理群，〈建國初期：1949-1955〉，《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頁46。相似觀點，可參考林蘊暉，〈一九五三年的歷史定位〉，《國史簡記·史論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楊奎松，〈從「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與中央領導人在農民糧食問題上的態度異同與變化〉，《開放時代》2013年第6期（2013年11月），頁164-190。1953年的歷史地位也被《創業史》濃墨重彩地表現出來，在「第一部的結局」中，柳青仿佛一位社會科學家，用策論的口吻綜述了1953年的種種重要意義。柳青，《創業史》，頁490。

⁸⁵ 羅平漢，《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3。趙樹理的這一意見幾乎被原封不動地寫進決議草案當中，但是，在後來的現實操作中，農民的後一種積極性並沒有得到充分保護。

⁸⁶ 錢理群，〈建國初期：1949-1955〉，《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頁53。

民幣四百萬，秋天至少要買上十畝田，請上兩個幫工。」⁸⁷顯然，勤勞樸素的農民已經在盤算屬於個人家庭史的「五年計劃」了，讀者可以感受到農民在擁有自己的土地後，所迸發出的火熱幹勁兒。應該說，大部分農民並不願意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土地獻出來。⁸⁸

五、「小仁政」，「大仁政」：舊問題，新境界

那麼，如何緩解這種來自現實的尷尬、矛盾與無奈？毛澤東提出了「區分兩種仁政」的理論：「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⁸⁹

前者帶有「當前性」，關切農民的目下利益；後者指向「長遠」，

⁸⁷ 劉澍德，〈橋〉，收入孔羅荪、朱寨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頁41。

⁸⁸ 這一時期農村題材不可能直接表現現實中的反抗，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農民主動獻地，即使這個過程有齟齬，它也是以辯論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最終勝出的一方一定是國家。亭麵糊、梁三老漢、宋老定、韓百安、馬子懷等老農角色展現了這種內心過程的艱難苦澀與千回百轉。但是這種勝出是「勢」的勝出，而非「理」的勝出，關於這一點，藍愛國有精彩的分析：「從亭麵糊這類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為何十七年鄉村會成為日趨激進鄉村的根源。因為在鄉村看來，革命總是他們的代言人，無論革命做什麼都是為了他們的幸福，因此，他們只須跟著革命走，即使受苦受難，也不會改變他們對革命的基本態度。」參見藍愛國，《解構十七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26。樸素的農民無法像高蹈的決策者那樣，高屋建瓴地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農業合作化有全域式的領會，而1949-1966年間的文學便發揮了教化與規訓的意識形態功能，它生產出一種代償機制，即對現實生活的補償。現實生活的匱乏正是文本極力需要彌補的。吊詭的一幕出現了，「匱乏的」以另一種「豐盛的」形式被表現出來，二者構成為平衡現實與文本的二律背反，用豐盛來療救匱乏，以匱乏來呼喚豐盛，於是我們看到這一時期的農民積極獻地，義無反顧，有極高的政治覺悟，對各種政治新名詞津津樂道，它超越了農民樸素的本能情感與欲望。就是在這一個過程中，文學作為一種語言形式，產生了某種述行性。

⁸⁹ 毛澤東，〈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05。

關切民族國家的整全命運。前者理應是後者的基礎和起點，是通向後者的，但是，在 1950 年代，它們卻表現為「小」與「大」、「當前」與「長遠」、「局部」與「整體」之間的衝突。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宏業，有必要以後者為鵠的，甚至在政策的實際操作中，暫時地割捨掉「小仁政」。

在此刻的語境中，「大仁政」，用毛澤東的話說，是送給農民的「新的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⁹⁰ 毛澤東注意到這樣的事實：「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⁹¹ 從源頭上杜絕農村的兩極分化是他心目中「最大」的「仁政」。政策制定者擔憂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對空間陣地的爭奪，劉澍德的〈橋〉對此有所反映：「他們是反對入社。……不消擔心，這個鬥爭是免不了的。這是資本主義跟我們搶奪農民來啦！」⁹²

所謂生產效率並非是抽象言說對象，它涉及到農民間實實在在的雇傭關係——即使在打土豪分田地後，農民在財富均一的起跑線上，⁹³

⁹⁰ 毛澤東，〈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係〉，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196。

⁹¹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187。

⁹² 劉澍德，〈橋〉，收入孔羅荪，朱寨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卷）》，頁 36。

⁹³ 這只是一個籠統的或理想的說法，實際上，並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均一」。土改時期，有的幹部獲得了更多、更好的土地，這是一種起點的不平等。這批人在農村題材中，是黨的鄉村「本地幹部」如郭振山、范登高等。這種起點的不平等也是他們不願參加合作化運動的原因之一，因為合作化運動意味著再次抹除空間資本的個體差別。比如，《創業史》中梁大老漢以農民的直覺道破這一點：「這不是二次土改嗎？這不是把這回土改叫成辦社，巧收咱富裕戶的車、馬、田地嗎？」但從總體而言，土改後鄉村的貧富秩序的確有了改變。參見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頁 655。

但當某一個體的生產效率提高時，自然還會出現新的貧富差距，這是農村題材中湧現的「新中農」角色背負的歷史負擔。而一批反映土地集體化的小說關心的是「土改後的第二天」，即農民獲得土地後，在財富基本均一的起跑線上，是否要進一步產生新的階級分化，產生新的富農、地主與新的貧下中農？⁹⁴

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用素描筆法勾勒了顧湧的發家致富史與剝削的起點：

顧湧那時是個攔羊的孩子，哥哥替人攬長工。兄弟倆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灑在荒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過去，他們經過了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被殘酷的歷史剝蝕著，但他們由於不氣餒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土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頭來了。因為家屬的繁殖，不得不貪婪的去佔有土地，也更由於勞動力多，全家十六口人，無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裡去，可以征服土地，於是土地的面積，一天天推廣，一直到不能不雇上很多短工。於是窮下來的人把紅契送到他家裡去，地主家的敗家子在一場賭博之後也要把紅契送給他，他先用一張紙包契約，後來換了塊布，再後來就做了一個小木匣子。他又買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有兩個大院，誰都說這麼多年來就他們家有風水，人財兩發。⁹⁵

⁹⁴ 早在 1948 年 7 月，新華社信箱〈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中就指出：「農民在分得土地後，是作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他們的生產條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變。有些農民，因為生產條件比較有利，又努力生產，善於經營，他們的經濟就可能發展，而逐漸地富裕起來，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進行剝削，而成為新的富農。而另外有些農民，因為生產條件比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產，或者不善於經營，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擊，他們的經濟就不能發展，而逐漸地貧困下來。」轉引自羅平漢，《當代歷史問題叢記二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7。

⁹⁵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 1937-1949·第九集·長篇小說卷二》，

小說反映的是土改之前的情況。土改之前，農村的貧富差距與階層固化已然存在，但勤勞苦幹的農民尚且有躋身剝削者的可能性；而在經歷了土改運動之後，農民們大約站在同一的財富起跑線上，這一可能性只會變得更大。丁玲是少有地誠實面對農村財富崛起者的故事，⁹⁶她沒有回避顧湧一家不分晝夜、把命都拼到地裡的辛勤勞動，也寫到地主的敗家子的賭博與揮霍，這一切原因使他們改變了自己的階級面貌。

《創業史》中梁生寶對梁三老漢循循善誘的「引導」，從時間和邏輯上，均可續接著上文所引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同的是時代變換，相同的是這其中致富的想像圖景與軌跡：

「啥叫自發的道路呢？」生寶說，「爹！打個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十畝稻地，是吧？我甬領導互助組哩！咱爺倆就像租種呂老二那十八畝稻地那樣，使足了勁兒做。年年糧食有餘頭，有力量買地。該是這個樣子吧？嗯，可老任家他們，勞力軟的勞力軟，娃多的娃多，離開互助組搞不好生產。他們年年得賣地。這也該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後，老任家又和沒土改一樣。地全到咱爺倆名下了。咱成了財東，他們得給咱做活！是不是？」

.....

梁三老漢為了表示他的心善，不贊成殘酷的剝削，他聲明：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500。該書版本眾多，初版本為《桑乾河上》，東北光華書店1948年版。後由新華書店於1950年出版校訂版，易名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此後，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初印本（1952年）、修改本（1955年）、重印本（1979年）。《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第九集·長篇小說卷二》採用的是東北光華書店1948年的初版本。

⁹⁶ 之所以言之「少有地」是因為更多的作家回避了地主、富農、中農的發家史，只簡單地將其原因歸咎為運氣，容下文詳述。

「咱不雇長工，也不放糧。咱光圖個富足，給子孫們創業哩！叫後人甬像咱一樣受可憐。……」

「那不由你！」生寶斬釘截鐵地反駁繼父，「怪得很很！莊稼人，地一多，錢一多，手就不愛握木頭把兒哩。扁擔和背繩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時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個兒做活。爹，你說：人一不愛勞動，還有好思想嗎？成天光想著對旁人不利、對自個有利的事情！」

老漢在鬍子嘴巴上使著勁兒，吃力地考慮著生寶這些使他大吃一驚的人生哲學。⁹⁷

梁生寶對自發道路前景的展望（「十年八年以後，老任家又和沒土改一樣，地全到咱爺倆名下了」）與內蘊其中的道德負疚令梁三老漢「大吃驚」，梁生寶的這套在整黨學習會上學來的道理，對於傳統小農來說當然是一種陌異觀念，它的心之所繫超越了個體心心念念的私人創業史。

無獨有偶，梁生寶的這番諄諄教導在秦兆陽的〈劉老濟〉與劉澍德的〈橋〉中再次出現：

「土地改革了！」他像喊口號似的叫起來，「好了！有了地了！我領到土地證，三宿沒睡著覺。可是，先別喜歡。我思前想後，覺著：「平分，平分，怎麼是個平？往後，誰家沒個三病兩痛，生老病死？誰能保得住不碰上天災人禍？到那時候，賣地吧！賣地吧！有錢的，就又成了財主，又有了窮富了。是的，日子在乎各人過，會過的，肯賣力氣的，有人力的，就窮不了，也興還要買房買地。可是，『天下農民是一家』這句話你能忘記嗎？你買了人家的地，人家不就沒了地啦嗎？」⁹⁸

⁹⁷ 柳青，《創業史》，頁114-115。

⁹⁸ 〈農村散記〉是由數個短篇組成，〈劉老濟〉是其中之一。參見秦兆陽，〈農村散記〉，《人民

他們日日夜夜，盤算著：咋個存糧，咋個放賬，買多少田，雇幾個長工，……全是打從前苦在一起那些窮哥們的主意。鄉親父老們，照這樣搞下去，不上幾年，「土基落水，返本還原」，富了一戶，苦了千家，這是資本主義的老路子，不是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千萬走不得！⁹⁹

這種想像中的愁煩，或者說是對階級苦難史重演的擔憂，往往以推心置腹、苦口婆心的語氣被表現出來，其語重心長的文學式（細節豐富、帶有強烈情感力量）敘述成為了這段時期尤為動人的人文風景。它展現了深厚溫暖的公共關懷和素樸健康的鄉村情感，所展露的氣象越過了私性話語與短淺眼光，從而帶有廣闊的超越性。這紮根於那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想像，對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等美好願景的懇摯嚮往。這種迫切緊張、生動細緻、稍感粗糲直露但卻如此熾熱稚拙的道德論述，在之後的文學中，我們較少看到。

問題產生了迴旋，情節的發展邏輯貌似又回到了土改小說中去。但按照螺旋式上升的歷史卻已然進入了一個新「境界」——作家展示富農或地主的資本積累的方式與後來的「新中農」有本質不同。對待後者，作家還是抱有同情、規勸和期待的心態，而對前者則是否定、貶斥和諷刺的態度，他們發家的過程也被作家設定為非法，因為只有這麼做，作家才可以將土改中財富重新分配所蘊含的暴力性合法化，故事的情節才可以以一種良好德性的方式持續進行。否則，小說所構築的意識形態大廈就會出現裂痕，預設的敘事邏輯就不能自治，其試圖傳達的理念與自身迸發的說服力量都會顯得羸弱。「把具體的情節結構和他所希望賦予某種意義的歷史事件相結合。這個做法從根本上

文學》1953年第5期（1953年5月），頁19。

⁹⁹ 劉澍德，〈橋〉，收入孔羅荪、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卷）》，頁12。

說是文學操作，也就是說，是小說創造的運作。」¹⁰⁰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道破小說敘述的虛偽之處：「有些敘事是虛假的，它們排除創傷性事件，再對由此產生的空洞打上補丁（bug）。此類敘事是為了調解一些根本性的衝突，通過重新安排時序以達成時間方面的連續性。正是敘事的這個特質坐實了一些被壓抑的矛盾之存在。」¹⁰¹

那麼，以《創業史》為例，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作家是如何設定富農與部分富裕中農的發跡史和財富起源的——我稱之為稀裡糊塗的「運氣致富」模式：¹⁰² 這共同體現在姚家的、郭世富、梁大老漢的創業史。姚富成的原始積累源於逃兵的意外饋贈，「一百二十兩銀子」，¹⁰³ 之後買地而輕鬆致富，幾近天方夜譚。郭世富的致富也是由於「意外的事情」¹⁰⁴（被選中獨家承租好的稻地）。同樣離奇的還有梁大老漢最初發跡的故事。

「運氣」（偶然與神奇）是最不具備合法性的形式之一，它給人一種不勞而獲之感與合情的嫉妒。這揭露了一個隱蔽但卻異常重要的問題，即柳青（1916-1978）似乎無法從錯綜複雜的現實關係中，誠實地回答郭世富、姚世傑們到底是怎麼比其他人先富裕起來的，而「偷懶」地採用了「運氣致富」的敘事動因。因為運氣是一個太可輕易被批判（同時又「政治正確」）的對象。但現實生活中，地主、富農以及

¹⁰⁰ [美]海頓·懷特著，張京媛譯，〈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65。

¹⁰¹ Slavoj Žižek,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New York: Verso, 2008), p.12.

¹⁰² 「富農」這一階級形象在《創業史》中是極端負面的。不過，中共中央對富農的階級定位，是在1954年才正式定型，但《創業史》的故事時間是被設定在1953年。（我們再次遇到了「1953年」，關於1953年的歷史定位，在前文已有論述。）《創業史》的故事時間與發表時間的「間隔」值得注意，故事時間是1953年，正是互助合作運動逐漸發軔茁壯的時候，統購統銷的政策也是在這一年冬天被確定。但《創業史》並非寫於1953年，而是最早發表於1959年，第二部甚至發表於1970年代末。這意味著作者有足夠的時間來「修正」文本。

¹⁰³ 柳青，《創業史》，頁455。

¹⁰⁴ 柳青，《創業史》，頁62。

接近富農的富裕中農並不可能都是通過運氣致富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誠懇的辛勤勞動而腳踏實地地發家。深入農村的柳青不可能不清楚這條常識。但頗為遺憾，柳青仍然把三位類同角色的發家史都設置成「運氣致富」，這就生成了一種敘事症候，顯示了闡釋的焦慮。¹⁰⁵ 運氣致富本質上是一種陳舊的宿命觀，而在情節的經營上，則是智力偷懶行為，違背現實主義的要義。對負面角色的運氣致富的前史安排方式回避一種深入討論的思想準備，約減了現實固有的複雜性。

而崛起於土改運動的黨的「本地幹部」郭振山在分到土地後被塑造為汲汲於自發道路的新中農，但作者對他的態度還是不同的，以下引文是郭振山的個人發家的「五年計劃」：¹⁰⁶

感謝土地改革，給了幸運的郭振山這創家立業的堅實基礎……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積趕上郭世富。以此為限，絕不超過。他絕不使自己的家業接近仇人姚士杰，那和他的「政治性兒」水火不相容。他一根椽一根檁地備料，人不知鬼不覺地準備在他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從一九五六年起）蓋瓦房。先蓋正房，第三年（一九五八年）蓋東西廂房，第五年（一九六〇年）蓋前樓。……誰知剛剛露了頭，就被黨支

¹⁰⁵ 實際上，負面人物的「運氣致富」模式並非柳青一人才有的孤例，它在《三家巷》中也被作者採用，《三家巷》中，周、陳、何三家貧富差距開始急劇擴大，階級分野產生——周家的代表周鐵也把何家發家的原因歸咎為由水災帶來的機遇，至於陳家的發跡，敘事者甚至給不出原因，只用「不知怎的」四個字糊弄了過去：「不知怎的沾了個洋字的光，幾個筋斗就翻上去了。」以上情節見歐陽山，《三家巷；苦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46、44。該版據196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鉛印本重印。《暴風驟雨》中也是這樣：「韓大棒子韓風岐，偽滿乍一成立時，是中等人家。往後，他猛然發家啦，年年製地。在本屯、在賓縣、在佳木斯，都有他的地。」以上情節見周立波，《暴風驟雨（下冊）》，頁38-39。

¹⁰⁶ 農民個人的「五年計劃」與國家宏觀的「五年計劃」的並置是這一時期小說的一個有意味的特點，在上文的〈橋〉中也曾出現個體農民的「五年計劃」。

部發覺了。¹⁰⁷

郭振山有足夠的「政治性兒」區別於邪惡的剝削階級。他的渴望尚屬於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被理解的願望，強調的還是通過辛勤誠實的火熱幹勁兒而發家。這段話中涉及到很多空間的資本積累（土地面積，正房，廂房，前樓），空間在這裡既是個人富裕的內容材料也是其外在形式，郭振山的幹勁兒出於空間的私有性質，後者依賴土改運動對空間關係的重組。但這裡的空間關係的「重組」只是在原有框架結構內的簡單變革（空間所有權的易主），而這一結構本身（空間制度的私有制形式）並沒有改變，因此郭振山才「感謝土地改革」的財富洗牌行為。可是，一個新的迴圈就要到來，（「誰知剛剛露了頭，就被黨支部發覺了」），這次是對傳統土地制度的釜底抽薪，其革命性在於，前次的所有權是由個體（地主）到個體（農民），這次是從個體（私）到國家（公）。

六、結語

農業集體化是與心靈的集體化互為建構過程。毛澤東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提綱中，簡筆提及農業合作社的一個任務是讓農民「習慣於集體生活」。¹⁰⁸「農業集體化是一場改變幾千年農業傳統經營方式的革命，也是中國共產黨改造和重建鄉村社會結構的宏大社會實驗與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¹⁰⁹ 它試煉、考驗著

¹⁰⁷ 柳青，《創業史》，頁 179-180。

¹⁰⁸ 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冊 6，頁 311。引文中「習慣於」的標點為原文所有，在此予以保留。

¹⁰⁹ 郭於華，〈心靈的集體化：陝北驢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4 期（2003 年 4 月），頁 79-92、205-206。

人性，個人欲望、階級關懷、理想主義、犧牲精神等諸多並不一致甚至互斥的話語扭結在一起，催逼出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同抉擇；而身處複雜現實的作家，在意識形態的規約下，從盤根錯節的關係中取精用弘，提煉出公與私、遠與近的「兩條道路」的基本情節衝突，並呈現了歧路的緊要關節——即「不要走那條路」，再次展現 1949-1966 年間文學的現實參與感與強勁的意識形態之教化力量。

通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發現，在這一時期農村題材小說中，任何個人的敘事似乎都浸染了國家敘事，而任何國家敘事也會還原到個人敘事：個人的一個舉手，一瞥偷窺，或者一個充滿意味的眼神、一副掠過的表情都是及物的，而不再局限於個人敘事的閉環。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它所涵蓋的具體可感的無量細節，是被那一時代的政治尺度衡量的，是由歷史的重大事件測定的，其理想狀態是塑造出源源不斷的社會主義新人，在這裡，每個人的理想生活與社會主義共同體有著同等間距，並最終達到衡量個人生活事件和衡量歷史事件的尺度是同一的。

這就涉及到了這一時期文學的可靠性問題。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 1962-）在《當代敘事學》中區分「虛構與現實」「虛假與真實」之間的關係。¹¹⁰ 小說固然都是虛構，但作為研究者，應清醒地分清「虛構」與「虛假」的區別。王彬彬用豐沛的細節論證《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¹¹¹ 而《紅旗譜》在這一時期文學中，已屬上乘之作。因此，需要問的是，1949-1966 期間的小說能否被視為「生活的一面鏡子、生活的一種翻版，或把文學當作一種社

¹¹⁰ [美]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96。

¹¹¹ 王彬彬，〈《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5期（2010年9月），頁22-39。

會文獻」？¹¹² 一句話，它們能否獨立擔當文化研究的腳本和材料？馬克思評論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作品、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評論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作品時都用了「鏡子」這一詞語，這表明他們對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信任，原因在於兩位文學家的作品達到了「真實性」的要求，可以作為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第二文本。但很遺憾的是，1949-1966 期間的文學並未達到此種境界——這是本文不得不指出（提醒）的。

第五節曾論及《創業史》「闡釋的焦慮」，富農「運氣致富」的敘事模式客觀上造成了一種智識上的懶惰，但不應忽略的是，柳青本人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孜孜矻矻的作家。他的另一身份是紮根長安縣的「副書記」，一名共產黨員。從這個角度說，他也是國家政策的認同者、推動者和執行者，這一「社會主義工作者」的身份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有效地推動集體化，因此他在創作時會對素材進行萃選，以達「正確的虛構」。¹¹³ 所謂「闡釋的焦慮」又可能是有意識的書寫策略。

因此，我們不僅要探討「文本內部的社會存在」，還要聯繫「文本周邊的社會存在」。又如第三節論及新農具、新技術、新良種的使用，那麼，如何看待文學文本中集中出現的這類意象叢？首先需要問的問題是敘事文本與歷史現實是否合轍一致，其次是敘事者的態度，最後是研究者的態度。但是，當人類學者、歷史學者與文學研究者面對同樣的「歷史細部」而出現了分歧時，就有必要呈現這種分歧，並讓讀者自行判斷。

¹¹² [美] 勒內·韋勒克、[美] 奧斯丁·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新修訂版）》，頁 93。

¹¹³ 轉引自王再興，《中國當代農村小說研究（1949-196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98。

最後，我想通過下面的例子來說明用整體的歷史語境分析 1949-1966 期間小說之必要性和有效性。徐剛在一篇文章中批評了九十年代新歷史主義小說對歷史的呈現之偏頗：

無論如何，小說以某種歷史的「真實」徹底屏蔽了萬千群眾在「土改」運動中翻身解放的喜悅。而這種劃時代的歷史變遷，則恰恰是革命中國的歷史遺產及其內在本質，它讓整整一個階級的人群成長為真正的歷史主體，其深切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¹¹⁴

我們不應該僅僅拘泥於作者的不滿，而應聯繫起其不滿的歷史語境。對這段話構成反諷的是，徐剛提及的「屏蔽」剛好與 1949-1966 農村題材小說構成了「鏡像般的空缺」：因為在 1949-1966 農村題材小說（向前延伸至延安文藝）中，「土改運動中翻身解放的喜悅」幾乎觸目即是。應反思的是為何九十年代新歷史主義小說不約而同採取了上述被徐剛批評的立場，這其中有沒有來自作家在歷史暴力下催生的「報復性嘔吐」？這段針對 1949-1966 農村題材小說「後史」的當下評述也有利於讀者更立體多面地理解這一時期小說的歷史語境。——這要求文學研究者面對這一時期文學時，跳脫出文本內部的風景，站在歷史的燈塔去做整體的瞭望；而這，正是本文努力去付諸實踐的。

（責任校對：張惠淳）

¹¹⁴ 徐剛，〈歷史之名，或虛構的儀式〉，《山花》2018年第6期（2018年6月），頁140-143。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 1937-1949·第九集·長篇小說卷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489-748。
-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 _____，《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 _____，《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辦公廳會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上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
- 孔羅蓀、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下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 王再興，《中國當代農村小說研究（1949-196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 王彬彬，〈《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學」藝術分析之一〉，《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5期，2010年9月，頁22-39。
-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李里峰，〈群眾運動與鄉村治理——1945-1976年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解釋框架〉，《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2014年1月，頁218-230。
-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周立波，《暴風驟雨（下冊）》，天津：新華書店，1949年。
- _____，《禾場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
- _____，〈關於《山鄉巨變》答讀者問〉，收入《周立波選集·第六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23-527。
- _____，《山鄉巨變》，北京：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林耀華著，莊孔韶、方靜文譯，《金翼：一個中國家族的史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林蘊暉，〈一九五三年的歷史定位〉，《國史箝記·史論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頁76-81。
- 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
- _____，《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
- 茅盾，〈略談工人工藝運動〉，《小說月刊》第3卷第1期，1949年10月，頁4-7。
- 秦兆陽，〈農村散記〉，《人民文學》1953年第5期，1953年5月，頁9-20。
- 徐剛，〈歷史之名，或虛構的儀式〉，《山花》2018年第6期，2018年6月，頁140-143。
- 浩然，《豔陽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張培田等編，《新中國法制研究史料通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張檸，《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利分析（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
- 莊孔韶，《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增訂本）》，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
- 郭於華，〈心靈的集體化：陝北驢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2003年4月，頁79-92。
-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 陳思和，〈六十年文學話土改〉，收入胡星亮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5卷第3期，2010年11月，頁22-49。
- 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
- 楊奎松，〈從「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與中央領導人在農民糧食問題上的態度異同與變化〉，《開放時代》2013年第6期，2013年11月，頁164-190。
- 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和國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劉紹棠，〈擺渡口〉，收入中國作家協會編，《一心入社》，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頁1-8。
-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潘家恩、張振、溫鐵軍，〈「鐵鉤」與「豆腐」的辯證——對梁漱溟 20 世紀 50 年代思想張力的一個考察視角〉，《開放時代》2018 年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99-117。

歐陽山，《三家巷；苦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

駱賓基，〈父女倆〉，《人民文學》1956 年第 10 期，1956 年 10 月，頁 83-93。

_____，〈我的創作歷程——為了悼念雪峰、荃麟和彭康等同志〉，收入《初春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96-321。

錢永祥，〈自由主義如何看到了「底層」——讀邁克爾·弗里登《英國進步主義思想》有感〉，《讀書》2019 年第 7 期，2019 年 7 月，頁 51-61。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_____，《1949-1976：歲月滄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年。

謝淑玲，〈駱賓基建國後小說創作的心路歷程〉，《遼東學院學報》2013 年第 6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0-134。

韓丁，《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8 年。

藍愛國，《解構十七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羅平漢，《當代歷史問題筭記二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_____，《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美〕勒內·韋勒克、〔美〕奧斯丁·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新修訂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

〔美〕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加〕莫伊舍·普殊同著，康凌譯，《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再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法〕路易·阿爾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爾著，李其慶、馮文光譯，《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Locke, Joh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Žižek, Slavoj.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New York: Verso, 2008.

二、報刊文獻

〈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第20號，1955年11月28日。

志，〈關於「新事物」〉，《文藝報》，1951年8月25日，頁32。

胡繩，〈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日報》第5版，1994年6月16日。

鄧子恢，〈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和方針政策——一九五三年七月二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日報》第1版，1953年7月22日。

Land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ese Rural Fiction (1949-1966): A Study from Political-Economic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Shang-Shi Song*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spatial practice from 1949 to 1966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d system,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rural themes found in fictional works. During this period, land wa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production.” On the one hand, such “production” referred to “production from space,” i.e., driving up grain yields per *mu* of land by applying new tools, better seeds or upgraded cultivation methods. ; On the other hand, it meant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e., digging canals, diverting rivers and initiating other water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expand arable spaces. By using these spatial perspectives, I try to uncover structural problems within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While the Movement’s advantage lay in large-scale space projects such as land reclamation, channelization, water conservancy, etc., it became stretched thin in small sized “intensive cultivations,” where most of the conflicts in the storylines were set.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increases in production” lay in the fact that it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both a relationship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its socialist counterpar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y are entangled in literary texts. The confrontation

* Lecture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in these texts is also a mirror image of the broader ideological battlefield outside of texts.

In this article, I consider this dialogue in depth and analyze fictional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spatial theorie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intertextual threads and places them in a broader “social text” in an effort to explore their richness.

Key words: rural themes, collectivizatio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land reform, spatial theory

